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 ZHONGGUO FOJIAO SIXIANG SHIGAO

##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第三卷 宋元明清近代卷（上）

潘桂明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 ZHONGGUO FOJIAO SIXIANG SHIGAO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第三卷 宋元明清近代卷（下）

潘桂明 著



凤凰文库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ZHONGGUO FOJIAO SIXIANG  
SHIGAO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第三卷·上)

本书是对中国佛教思想所做的综合考察和全面论述，内容自佛教传入至近代，时间跨度约两千年之久，涵盖佛教思想史上的主要人物、学派和宗派，及其相关的重要哲学范畴和命题；阐述并分析这些范畴、命题的演变过程，揭示在这个过程中体现的文化内涵、思维特征和知识取向。

全书由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三卷组成。第一卷详细考察和分析了中观学派的中道实相原理及其思维方式向涅槃佛性系统的心性学说转化的内在依据、文化背景，描述了这种转化的具体历史过程及其表现形态；第二卷对隋唐五代佛教宗派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予以重点分析和阐释，指出各宗派之间的思想联系以及矛盾差别；第三卷着重研究和阐明衰退时期中国佛教思想的基本形态，辨析产生这些形态的文化前提，推及传统佛教思想向近代过渡和转化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基于对佛教思想与儒、道两家学说关系的周密论证，既为学术界提供佛教思想研究的必备知识，又为深化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提供新视角、新思路。

本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佛教思想研究”的最终成果，结项鉴定为优秀等级，鉴定专家组认为，此书“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佛教思想通史著作，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研究空白”，“不仅是佛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成果，也为纠正学术界的浮躁风气，提供了学术典范”。作为个人的学术研究成果，该著凝结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使之具有立论的全面性、系统性以及独创性等鲜明特点。资料广博而详实，内容周全而厚重，述论严密而深刻，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学术价值。

上架建议：宗教研究

ISBN 978-7-214-06060-0

9 787214 060600 >

定价：235.00元（全三卷）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 ZHONGGUO FOJIAO SIXIANG SHIGAO

##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第三卷 宋元明清近代卷（上）

潘桂明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 ZHONGGUO FOJIAO SIXIANG SHIGAO

##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第三卷 宋元明清近代卷（下）

潘桂明 著



凤凰文库  
PHOENIX LIBRARY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GROUP  
江苏人民出版社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第三卷,宋元明清近代卷/潘桂明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11

(凤凰文库·宗教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214 - 06060 - 0

I. 中… II. 潘… III. 佛教史:思想史—研究—中国—  
宋代～近代 IV. 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5611 号

###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 第三卷 宋元明清近代卷

著 者 潘桂明

策划编辑 府建明

责任编辑 戴宁宁

装帧设计 武 迪 姜 嵩 许文菲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 mm×1 304 mm 1/32

印 张 88.125 插页 24

字 数 2 2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6060 - 0

定 价 235.00 元(全三卷)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 目 录

## 第一章 宋代思想界的概貌 1

第一节 佛教思想与程朱理学 1

第二节 衰颓中的佛教思想 66

第三节 智圆及其《闲居编》 98

第四节 契嵩及其《辅教编》 120

## 第二章 宋代佛教思想的演变 150

第一节 天台佛教内部思想论争 150

第二节 黄龙派与杨岐派的思想分歧 180

第三节 文字禅的形成和发展 205

第四节 看话禅对默照禅的批判 218

第五节 宗杲的“忠义之心”说 245

第六节 宋代的士大夫禅学 265

第七节 王日休的净土念佛思想 316

## 第三章 金元时期的佛教思想 327

第一节 万松行秀及其门下的禅学 327

第二节 元代的临济禅师和禅学 362

第三节 天台佛学的局部承绪 393

第四节 白莲宗的净土思想 407

第五节 藏传佛教思想的展开 421

**第四章 明代佛教思想的维系 437**

第一节 宋濂的佛教思想 437

第二节 道衍及其《道余录》 459

第三节 传灯的性善恶论 471

第四节 明代临济禅和曹洞禅思想 490

第五节 阳明心学与晚明士大夫佛学 549

第六节 “四大高僧”的佛教思想 611

第七节 晚明佛教义学余绪 655

**第五章 清代佛教思想的民俗化 697**

第一节 明末遗民的佛教思想 697

第二节 雍正帝胤禛的“御制”佛学 718

第三节 清代禅宗思想概述 744

第四节 “四大名山”的佛教文化 786

第五节 藏传佛学的发展变化 804

**第六章 近代佛教思想述略 828**

第一节 经世传统与近代佛学情怀 828

第二节 支那内学院的教理反思精神 864

**参考书目 890**

# 第一章 宋代思想界的概貌

## 第一节 佛教思想与程朱理学

儒家“辟异端”的传统在汉代“独尊儒术”后得到进一步发扬，“独尊儒术”保证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意识形态地位，并展开对佛、道的持续排斥和改造。虽然佛教在义理阐述和思想深度上获得空前成功，但是即使在它的鼎盛时期也未敢正面挑战儒家的正统权威。事实上，面对世俗政治、社会文化系统的话语权力，佛教始终处于从属和依附的地位，甚至不得不采取自我辩护的形式，不断改变自己的教义、思想乃至思维方式，以保持与传统文化的一致性。六朝佛教学派的成立和发展，隋唐佛教宗派的形成和繁荣，没有真正脱离传统文化的背景，相反与传统文化的思维习惯、思考范围、思想兴趣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佛教传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夷夏之辨、形神之争始终是思想界的敏感话题，但是随着涅槃佛性学说的成长，佛教终于找到使儒、道两家表示认同的新话题，不久又通过撰著《大乘起信论》(以下简称《起信论》)，在传统思维习惯的基础上，完成为儒、道共同接受的思维理论。佛教学派和宗派虽然众多，但是真正能够持续久远、影响深广的，则是以

《起信论》为理论背景的“真常唯心论”系统，如天台、华严和禅等宗派。禅宗之所以风靡天下、蔚为壮观，成为思想史上的一大奇迹，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吸收，而这种吸收又借助于《起信论》的体用相即和本觉心性原理。

自涅槃学取代般若学而成为佛教显学后，儒者从关心传统人性问题的角度出发，开始对佛性理论给予高度重视，视之为人生意义和学术课题的核心。宗炳的《明佛论》说：“中国君子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心，宁知佛心乎？今世业近事，谋之不臧，犹兴丧及之，况精神我也？”（《弘明集》卷二）意思是说，儒家学说强调宗法礼义、世俗伦理的落实，却忽视精神现象、人性本质的探讨，与佛教的涅槃佛性论相比，存在着理论方面的重大差别。宋文帝也指出，“范泰、谢灵运常言，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政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理为指南邪？近见颜延之折《达性论》，宗炳难《白黑论》，明佛法深，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宋文帝集朝宰论佛教》，《广弘明集》卷一）。他意识到，佛教心性学说要远高于儒家的济世道理。

以涅槃学为学术论题的核心，佛教学者的兴趣转向佛性问题，随着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隆盛，有关心性问题的讨论如日中天。在这个过程中，儒、道两家学者逐渐感受到精神压力。唐代儒家学者刘禹锡目睹禅宗的兴盛，不禁慨叹曰：“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寝息。”（《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刘禹锡集》卷四）由于儒学很少涉及心性问题，所以遇乱世而无所适从，佛教则关注心性学说，“以大悲救诸苦”，故在乱世也深受欢迎。北宋王安石有感于儒家人才贫乏，孔孟之后未见杰出大儒出世，乃求教于张方平，张答以“儒门淡薄，收拾不住”，而“皆归释氏”（《大慧禅师宗门武库》，《大正藏》卷四七），说明佛教通过弘扬心性学说，不仅在与儒家交往中获得了生存空间，而且还吸引了大批儒家才智之士。

与此同时，随着佛教社会影响的扩大，特别是禅宗心性学说风靡丛

林内外,对儒家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一定的威胁,使儒家学者中也时而出现批评的声音。中唐时代的韩愈就是以儒家学者身份批评佛教的代表人物。

韩愈作《原道》文,对“道”作了如下界定:“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吉有凶”,佛教之道是小人之道,佛家之德是凶德,而儒家之道是君子之道,儒家之德是吉德。这种界定的主要理由,仍然不出传统伦理和民族文化两个方面,就是说,佛教出世的伦理观念与儒家完全悖离。韩愈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又说:“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原道》,《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一,四部丛刊本)在《论佛骨表》中,他提出相似的观点,认为“佛者,夷狄之一法,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故不合先王之法,与传统文化有别;“佛者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昌黎先生文集》卷三九)。

民族文化与夷狄文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遵循君臣父子之道,是否关注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韩愈对佛教的排斥,归根结底为了维护纲常名教。在韩愈看来,中国本来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先王之教,此先王之教的内容是“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义道德的标准即“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妻”等纲常名教。所以,要维护中华文化的传统,就要继承已为佛教破坏的“道统”,这个“道统”据说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脉相承,可惜“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原道》表述的是《大学》的思想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通过实施“三纲领”、“八条目”,达到最完善的道德境界(“止于至善”)和最高的社会政治理想(“治国平天下”)。韩愈认为,由《大学》所传承的先王之教具

有民族文化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决非佛教所代表的夷狄文化可以比拟，“古之所以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原道》）。由个体道德修养的完善而实现治国平天下理想，这种理念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韩愈的反佛思想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唐朝中央集权统治趋于瓦解的情况下提出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内涵。他的基本出发点，是为了强化儒家文化的正统性和权威性，重申中央集权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以“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这种极端的思想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儒家的衰微源于佛教的传入；正因为佛教思想有着极大的蛊惑性，所以借助宗派之法统而风靡天下，才使人们遗忘了民族文化传统，并中断了正统的儒学传承。“道统”的提出不仅针对佛教的“法统”，而且具有更深层的文化意义和承担精神。

《原道》的反佛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原道》所提出的儒家“道统”论，以及对儒家文化正统性和权威性的强调，则又对宋代理学核心精神的形成有明显影响。《大学》经韩愈的提倡和发扬之后，在宋代受到理学家们的高度重视，朱熹给予《原道》很高评价，云：“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朱子语类》卷一三七，中华书局 1986）

从儒家本位的立场上看，韩愈的反佛意志和“原道”精神都是毋庸置疑的，他既要为儒家文化的失落找到历史性根源，又要为趋于分裂的唐王朝找回传统文化的自信。但是客观地看，韩愈的思想方法是可以存疑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始终以主动的姿态寻求与传统文化的会通，并在经历了长期的本土化之后，已经逐渐融入传统之中，它的思想和仪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其他反佛人士相似，韩愈也未能以自觉的反省态

度,认真检讨儒家衰落的内部原因,从而找到真正的复兴之路。<sup>①</sup>相反,他们多数按照习惯的思维方式,从事物外部去寻找原因,并希望能通过历史的回顾,从历史的成功经验中展望未来,以为历史不仅具有参照价值,而且也是未来的必由之路。这当然还得有个前提,那就是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典范,作为正统思想和主流意识,儒家的真理性和绝对性毋庸置疑,佛教属于夷狄文化的一支,它具有先天的落后性和愚昧性;所以,只有回到儒家的传统,才能走出当下的困境。但是,这个前提是不能成立的。

韩愈被现代学者视为理学的先驱者,是因为他推崇《大学》、提倡道统、关注人性,但这些都只是就现象方面而言的。若就本质方面考察,韩愈表达的是一种传统,即复古的历史传统、习惯的思维传统,正是这种越千年而不变的传统,成为理学家们追溯和传承的理由。

五代时期,王朝急遽更替,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建立北宋。在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过程中,赵匡胤与他的大臣们就如何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作了认真讨论,如赵匡胤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圣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赵普答曰:“此非它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

<sup>①</sup>许多儒家人士则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提出反佛主张,这是一种更为直接的看法。在唐初傅奕的反佛理由中,已经提到这一点,并列举了许多事实。武则天在位时,狄仁杰指出,寺院“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旧唐书》卷八九),无益于国计民生。李峤也说,佛教经济的发展给国家利益带来了严重危害:“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赋,何以补之?”(《旧唐书》卷九四)中宗时,辛替否认为:“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卷八九)这些议论,似乎多具夸张成分。天宝(742—756)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经济利益之争更为突出起来。德宗时彭偃指出,僧尼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所费极大,所以他建议,令僧尼“就役输课”,与百姓同,“窃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然则陛下之国富矣,苍生之害除矣”(《旧唐书》卷一二七)。他们普遍把国家财政的困顿归咎于佛教寺院,就现象上说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若就本质上分析,恐怕决非根本理由。杨炎将当时国家财政收入受困原因,也部分地归之于佛教,他说:“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旧唐书》卷一一八)于是而制定两税法,据地出租,随户杂徭,推及寺院。

唯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续资治通鉴》卷二，太祖建隆二年）这是他们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问题在于，宋初君臣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立足于如何保障王权的稳定，如何维持帝王的专制统治，这正如司马光论《资治通鉴》的目的，乃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至于如何对王权统治、意识形态作全面反省，如何从百姓利益出发作积极回应，以理性的批判态度对待历史教训，则从未提到议事日程上。

伴随着儒学的持续衰微，禅学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自信，在中唐以后取代天台和华严的地位，成为佛教宗派思想的重镇，乃至成为整个思想界的热点。宋王朝的意识形态建设，必须面对虽已衰颓但仍影响广泛的禅学。在主张政治统一、思想不二的儒家人士看来，儒学的衰微与禅宗的兴起有着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禅宗的风靡、禅宗思想的狂放，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以及思想界的无序状态，最终导致统一王权的崩溃。所以，作为整顿思想界的第一步，就应该从发展经学和批判禅学入手。

汉儒治经，无论今文、古文，都是笃守师说，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坚持“疏不破注”原则，虽然统一了经义，平息了经学内部的争议，但是束缚了儒学的发展。自中唐起，儒者受禅学影响，疑古疑经之风渐兴，啖助撰《春秋统例》，陆淳撰《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不仅表达对《春秋》学的兴趣，而且体现出“舍传求经”的新学风。及至宋初，便有理学先行者胡瑗（安定）、孙复（泰山）和石介（徂徕）的新学风出现。

《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云：“宋兴八十年矣，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宋元学案》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胡瑗讲学，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学徒千数，“皆传经义，必以理胜；信其师说，敦尚行实”（《蔡忠惠公（蔡襄）集》卷三三《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之志》，转引自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

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33页)。胡瑗在太学当教授,曾出一题问学生:“颜子所好何学?”这相当于禅宗的公案,其实是无法作出正面回答的。他又教人“明体、达用”,意在建立与佛家抗衡的体用关系学院。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理学的形成。

孙复、石介的治学,不拘泥于字义训诂,而是直求经书的“微言大义”,探寻所谓圣贤的精神所在。如孙复(992—1057)不满汉唐的经注,要求“博求鸿儒硕老”,聚集于太学,“讲求微义,殚精极神,参之古今,覆其归趣”,使“我六经廓然莹然,如揭日月于上,而学者庶乎得其门而入。如是,则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复矣”(《寄范天章书二》,见《孙明复小集》,四库全书本)。欧阳修撰《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云:“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欧阳修全集》卷三〇,中华书局点校本2001)孙复又著《儒辱》,认为“仁义不行,礼乐不行”,乃是儒者之辱,它始于战国,“扬朱、墨翟乱之于前,申不害、韩非杂之于后”。汉魏而下,“佛老之徒横乎中国,彼以死生祸福、虚无报应为事,千万其端”,“去君臣之礼,绝父子之戚,灭夫妇之义”。因此,“夷狄诸子之法,乱我圣人之教”(《孙明复小集》),更是儒者的大辱。欲去此大辱,必须辟异端、排佛老。

石介(1005—1045)著《怪说》三篇,以为“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杨亿以淫巧浮伪之言破碎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中华书局点校本1984)。又说,佛教“灭君臣之道,绝父子之亲,弃道德,悖礼乐,裂五常。迁四民之常居,毁中国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经之教行,妖诞幻惑之说满,则反不知其为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他认为,“三光代明,四时代终,天之常道”,“五岳安焉,四渎流焉,地之常道”,“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常道”,若反之,则为可怪之事。衣冠礼乐、道德礼仪代表中华文化的核心,如今却“老观、佛寺遍满天下”,“释、老之为怪也,千有余年矣,中国蠹坏亦千有余年矣”(《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五)。他

又撰《中国论》，以为“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所以中国与四夷有着天壤之别。更为重要的是，“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所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婚祭祀所自用也，缞麻丧泣所自制也，果蔬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中国代表了衣冠礼乐之文明，而夷蛮戎狄处于野蛮状态，或被发文身、不火食者，或衣毛穴居、不粒食者，与中国的“人道”形成鲜明对照。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以其教易中国之教”、“以其文章易中国之文章”、“以其祭祀易中国之祭祀”，严重危及中国固有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道。由此可见，石介对佛教的排斥并不比韩愈高明，他要恢复的也是“尧、舜、禹、汤武、周公、孔子”一以贯之的道统，所以要追随“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韩吏部”，以使中华文化不致彻底毁于夷狄之手。

佛教借助心性学说，千余年来俘获了众多信徒，社会影响十分深广，所以孙复、石介等儒者都以排击佛教为己任，但是他们的排佛基本上没有涉及教义领域，即对佛教的思想学说、理论成就避而不谈，更不用说从根源上反思或检讨儒家学说的弊端。他们的反佛言论反映了儒家的习惯思维，即缺乏自我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因而不仅无助于儒学的进步，也无益于民族文化的成长。只有当儒家清醒地意识到反思的必要，并持续不懈地展开精神反省、自我批判的时候，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也才有理由成为文化的指导者、批评者。

与孙复、石介相比，自谓“排浮屠固久”的李觏(1009—1059)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儒者诟释氏，为其笼于世也，而不解其所以然。释之徒善自大其法，内虽不糙而外强焉。童而老，约而泰，无日不在乎佛。民用是信，事用是立”(《邵武军学置庄田记》，《李觏集》卷二三，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1)。又说：“儒失其守，教化坠于地。凡所以修身正心，养生送死，举无其柄。天下之人若饥渴之于饮食，苟得而已。当是时也，释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答黄著作书》，《李觏集》卷二八)“礼职于儒，儒微而礼不宗，故释老夺之”，“呜呼！释老不存，则寺观不屋，非

宗庙何适？儒之强则礼可复，虽释老其若我何？”（《孝原》，《李觏集》卷二）这就是说，儒家的衰微必须从自身找原因，儒家地位的恢复有赖于自身的强大，而不应计较佛教的繁荣，故“吾于此言乃责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答黄著作书》）。在了解禅宗心性学说之后，李觏甚至认为，佛教也有与儒家经典一致的地方：“释之行固久，始吾闻之疑，及味其言，有可爱者，盖不出吾《易·系辞》、《乐记》、《中庸》数句间。”（《邵武军学置庄田记》）在他看来，佛教之学俱备于儒家著作之中，如怀藏自家珍宝，却去数他人之宝：“欲闻性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从释氏而求之。”（《邵武军学置庄田记》）“释之言虽有可爱者，亦有圣人先已言之矣，何必去吾儒而师事戎狄哉？苟不得已，尚不如学老、庄，其意亦昭昭矣。”（《答黄著作书》）因此，通过儒家的“自大其法”，使人“无日不在乎儒”，重建一个以儒家为主体的，可与佛、道对抗的思想体系成为当务之急。

在李觏提出上述设想的同时，欧阳修提出了儒家“修其本而胜之”的基本策略。欧阳修（1007—1072）在《本论》中表述了自佛教传入后思想界的实际情况，说：“佛法为中国患千余岁，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尝去矣，而复大集，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遂至于无可奈何”；“千有余岁之间，佛之来者日益众，吾之所为者日益坏。”面对“攻之暂破而愈坚，扑之未灭而愈炽”的状况，使儒者颇感“无可奈何”（《欧阳修全集》卷一七）。欧阳修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人们只知道用行政手段对付佛教，但由于佛教的传播具有独特的思想基础，所以像韩愈那样试图通过“火其书”、“庐其居”的方式扑灭它，是不可能收到实际效果的。经过认真思考，欧阳修提出了“修其本以胜之”的策略，认为就此可以从根本上压倒和战胜佛、道两家。

所谓“修其本”，是指对儒学的发扬光大。欧阳修认为，儒家的衰微是儒家自身的问题，所以要消除佛教的广大影响，只能从儒家自身的发扬光大做起，这好比医者之于疾病，必须推究病患之所以，然后对症下药。因为“病之中人，乘乎气虚而入焉。则善医者，不攻其疾，而务养其